

.....
张远满
著

——土家族歌唱活动研究
——基于民间文艺表演队的调查

清江流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清江流域

土家族歌唱活动研究

——基于民间文艺表演队的调查

…… 张远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江流域土家族歌唱活动研究：基于民间文艺表演队的调查 / 张远满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 - 7 - 5203 - 0492 - 4

I. ①清… II. ①张… III. ①土家族 - 民歌 - 文化活动 - 研究 - 湖北
IV. ①J607.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324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熊瑞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01 千字
定 价 9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综述	(4)
一 歌谣研究	(4)
二 土家族歌谣研究	(13)
第三节 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	(20)
一 主要理论	(20)
二 研究方法	(23)
第四节 相关术语解释	(28)
一 民间歌谣	(28)
二 歌唱活动	(28)
三 歌唱传统	(28)
四 文艺表演队	(29)
第一章 生境：清江流域土家族歌唱活动的传承环境	(31)
第一节 生存的区域：族群与多元	(31)
第二节 有序的生活：生产与仪式	(37)
一 日常生活	(39)
二 节日生活	(43)

三 仪式生活	(46)
小结	(59)
第二章 表现：文艺表演队的组建与发展	(61)
第一节 传统的民间文艺组织	(63)
一 皮影演出队	(64)
二 灯会表演队	(64)
三 蕉草锣鼓队	(66)
第二节 社会变迁中的民间文艺组织	(69)
一 20世纪50年代：“双百”方针的鼓励	(69)
二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破四旧，立四新”	(73)
三 20世纪80年代后：公共活动的重建	(78)
第三节 文艺表演队的社会功能	(86)
一 娱乐审美	(87)
二 团结凝聚	(90)
三 社会教育	(92)
四 文化建设	(94)
小结	(98)
第三章 事件：从歌唱活动到文化表演	(100)
第一节 文艺表演队的规模及特点	(101)
一 民歌之乡——三里乡	(102)
二 从三个帮子到“黄四姐廉政文艺宣传队”再到“黄四姐 民间艺术团”	(105)
三 从综合农协到“村坊村歌舞队”和“河坪村老年腰 鼓队”	(127)
第二节 文艺表演队的歌者与民歌	(139)
一 文艺表演队与土家族传统民歌	(139)
二 歌者与民歌演唱场合	(147)
小结	(150)

第四章 内容：文艺表演队中的歌与唱	(152)
第一节 歌的文本构成与特征	(153)
一 类别	(153)
二 表演形式	(158)
三 模式化与程式性	(162)
第二节 唱的文化生存空间	(181)
一 物质空间：主家的准备	(183)
二 意识空间：外家的祝福	(186)
三 关系空间：两家的结合	(194)
四 人生仪式中的歌唱记忆	(198)
小结	(201)
第五章 典型：文艺表演队中的“黄四姐文化”	(203)
第一节 作为文化身份认同的《黄四姐》	(206)
一 黄四姐与货郎：文人的想象	(207)
二 黄四姐与黄师姐：神圣的信仰	(212)
三 黄四姐与喜花鼓：政府的建构	(215)
四 黄四姐的集体记忆：民众的表述	(221)
第二节 作为文化产业建设的《黄四姐》	(226)
一 三里乡：恩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	(227)
二 三里乡黄四姐山民歌大赛	(230)
三 “黄四姐”民族文化品牌	(234)
四 大型歌舞《风情黄四姐》	(238)
第三节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黄四姐》	(243)
一 三里乡文体服务中心的“非遗”保护工作	(244)
二 《黄四姐》进课堂	(248)
三 “非遗”里程碑：保护传承人	(250)
小结	(262)

结论	(264)
一 精神需求：从娱神到娱人	(265)
二 文化中介：从国家力量到民间文化	(267)
三 本土认同：从民间艺术到文化遗产	(270)
参考文献	(273)
附录	(283)
一 清江流域土家族地区调查点地图	(283)
二 河坪村老年腰鼓队演出节目单	(285)
三 黄四姐民间艺术团演出节目单	(291)
四 文艺表演队访谈录	(294)
后记	(306)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在中国民俗学界，历来就对民间歌谣十分重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轫也与民间歌谣有着密切的关系。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在校刊上逐日登载近世歌谣。1920年，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两年后，发行《歌谣》周刊。歌谣始终是民俗学者比较关注的对象，这主要缘于它具有显著的民族特性和地区色彩，不仅能代表当地的风土人情，还能直接地表达民众的感情、心理、意志和愿望，是民族思想结晶和精神气质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土家族定居内地，有史以来，土家人在不断的文化交流与排斥中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湖北省清江流域一带的土家族地区，人们有着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并产生了大量的民歌。土家人的任何活动都少不了唱歌：生孩子后要唱喜花鼓歌、结婚要唱哭嫁歌、丧葬要唱撒叶儿嗬歌、田里劳作要打薅草锣鼓、传情达意要唱五句子歌、盖房子要唱上梁歌、抬重器物也要吼个劳动号子来助兴。

作为一个土家人，儿时常在热闹的仪式场合，耳闻乡亲们高唱民歌。

当时，那种高亢而富有情感的歌声，并未引起笔者特别的关注。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系统学习后，本土意识渐增，这时才体会到歌谣是民族之宝，它保留了土家人质朴的个性，自然而然不矫揉造作。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导师林继富教授的指导下，带着学科的理论和观察方法，笔者又多次回到家乡进行田野调查，在走访中、在“打喜”的仪式上、在哭嫁的桌边、在跳丧的灵柩边、在乡民的排练中，笔者逐渐感知到歌唱这一艺术活动对于乡民生活的重要性。同时，围绕它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民间艺术表演团体，其成员亦是当地民众，这种产生于民众又服务于民众的团体是协调乡村生活秩序的中间力量，他们既宣传国家政策、与国家主流意识接轨，又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承着当地的民间文化，对乡村的文化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基于此，笔者决定选择“清江流域土家族歌唱活动研究——基于民间文艺表演队的调查”作为研究主题。

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讲，首先，突破歌谣研究过分文本化的学术倾向。民间歌谣是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咏的韵文部分，人类在创造语言之后就逐步创造了歌谣，由于不需要其他条件配合，人们可随时随地歌唱。那么，单纯以搜集整理出版的文本为歌谣研究对象，并不全面。因为这些文本在整理出版的过程中往往割弃了文本产生、传播和表演的语境，把原本流传于民间的“活态”的民间歌谣当作一个“死”的文本来研究。“在田野到文本的学术转换与学术表述层面上，对具体演述场域的‘深描’，有助于对口头叙事这一语言民俗事象的表演情境作出分层描写，形成关于表演过程的民俗学报告。”^① 歌谣文本脱离了其具体语境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我们强调文本与语境的关联。本书力求将土家族的歌唱活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一种“活”的形态进行研究，使其成为一种有具体语境和行为主体的文化事象。

其次，强调民间歌唱活动的生活性。民间歌谣是民族表述、记忆和传

^① 巴莫曲布嫫：《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承的主要方式，承载着民族的情感和文化基因。已有学者直接提出“歌腔”具有民族识别之意义，同样是区分民族的手段之一^①；后来以民族为单位划分并撰写的《少数民族音乐史》，不但突出了中国音乐的民族属性，而且进一步突出了除汉族之外其他各族的少数民族性。^②还有学者把民间歌谣与民俗比喻成一对孪生姐妹，“几乎每一种民俗事象，都伴有相应的歌；每一种歌，都反映一定的民俗事象。有的歌，就是民俗事象的躯体与灵魂，抽掉了歌，民俗活动就不存在了”^③。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民俗与民歌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伴而生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社会里，这种现象尤为突出。

当前土家族人口已过八百万，学者们对于土家族的研究跨越了历史学、人类学、方言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的界限，积累了不少优秀的成果，但对土家族歌谣的研究却很少。土家人常常在各种节日和仪式场合中传唱歌谣，唱歌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它自身所承载的民俗特质就是土家族的文化核心。因此，从民俗生活的角度去考察民间歌谣，有利于进一步挖掘土家族的文化特色，彰显土家族的民族意识。

最后，民间歌谣以口头演述、行为传承等方式存活，始终与变化着的文化语境相适应，传达和寄寓传承主体的鲜活情感。在湖北省清江流域土家族地区，民众自发组织了很多文艺表演队来传承当下的民间歌谣，这是值得重视的现象，它是本书对歌唱活动进行研究的切入点，也是本书写作的创新点。傅谨曾说起他对台州戏班的研究兴趣：“它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不是因为它们使我们有可能重构历史，而是因为它使我们有可能重构在现实社会中已经遭受相当程度破坏的，那种基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伦理、道德和信仰之上的社会秩序，至少是在艺术活动，尤其是戏剧活动中曾经有过的秩序，找到重构这种秩序的基石。”^④他的说法肯定了笔者选

^① 赵毅：《“族性歌腔”论》，《民族音乐研究》1998年第4期。

^② 袁炳昌、冯光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吴超：《中国民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④ 傅谨：《戏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择文艺表演队的意义：文艺表演队的历史变迁不仅能反映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变迁，更重要的是，它显示出了歌唱活动对乡村生活社会秩序建立的不可或缺的意义。

因此，在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在歌唱活动还比较活跃的地区深入研究其文化传统，跟随文艺表演队进入田野，了解其对当代社会秩序建立的意义，有利于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切实做好演唱环境、传承人和民间文艺组织的保护工作，为当代人合理利用民歌资源提供建设性路径。

第二节 研究综述

一 歌谣研究

有关歌谣学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学界已有大量的研究。歌谣时期搜集了全国各地大量的歌谣，面对歌谣中逐渐呈现出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学者们开始探讨歌谣的学问。

朱自清先生早在民国 18 年就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课程，后将朱自清先生的讲义编辑成册，出版为《中国歌谣》^① 一书。该书分为歌谣释名、歌谣的起源与发展、歌谣的历史、歌谣的分类、歌谣的结构、歌谣的修辞六章，可谓是最早的对民间歌谣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

钟敬文先生 1928 年编著了《歌谣论集》一书，该书收入了歌谣时期的重要文章，如周作人的《歌谣》、《中国民歌的价值》；胡适的《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卫景周的《歌谣在诗中的地位》；常惠的《我们为什么研究歌谣》等。在该书的序言中，钟敬文先生对五四以来的民间文学搜集和歌谣研究做了简单的评述：“数年来国人对于民间文学的搜集

^① 朱自清：《中国歌谣》，世界书局 1958 年版。

与探究，是新文学运动中一件很有声势与价值的工程；而就中最致力于这个工程的建筑的，尤不得不于我们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会首屈一指了。”^①这一时期的歌谣研究，“一方面，学者们致力于歌谣的本体论研究，着力讨论歌谣起源、艺术价值、表现手法、分类方式等文学层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则透过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揭示歌谣与历史社会的各种关系”^②。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时期，歌谣作为民俗的一部分被纳入语言历史研究所进行调查研究。这一时期的民俗研究，一方面使歌谣与民俗相结合，另一方面也把范围扩展至汉人以外的少数民族当中，从而也就使歌谣的含义由“民歌”、“农歌”延伸到了“蛮歌”，也即非汉民族之歌。^③

与此同时，民族学界也涌现出对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的热潮，歌谣作为研究对象之一被列为考察范围。其中，以凌纯声和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考察报告》最具代表性。书中专列“歌谣”一章，记录分析了“苗歌”的考察总况，用国际音标记下了四十四首苗歌并提供逐字对译和全文翻译的文本。为了达到准确记音，在记录每首歌之前，他们必请当地人将整首歌先唱一遍，再逐字逐句地用国际音标记录，然后由记录的人看了记录下来的音标唱诵一遍以求矫正，最后再请当地人用汉字逐字逐句地进行解释。^④

总的来说，“关于歌谣的含义，民国时期的关注者们大都同意与民间的‘唱’相关，但遗憾的是，至少在倡导‘文学革命’的阵营里面，却见不到多少对‘唱’的论述。于是不知不觉间，民歌的丰富内涵被压缩成印在纸上的书面文辞，其作用也只是供人阅读而已”^⑤。

^① 钟敬文：《歌谣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②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③ 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版。

^④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考察报告》，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279页。

^⑤ 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版。

从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中，我国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对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采集。特别是1958年，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采风运动。同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民间文学工作方针，《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一个群众性的民间文学搜集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在不长的时间内，搜集到了大量的新民歌和传统民歌。^①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化的解禁，民俗学重获生机，歌谣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尤其是1984年，大规模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启动，《中国歌谣集成》便是“三大集成”之一，为了让地方上的民间文学工作者更好更全面地搜集资料，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湖北分会编订了《歌谣研究资料选》^②，收录了早期歌谣研究者们的成果^③。这次文化搜集整理运动再一次掀起了学者们对歌谣研究的热潮，与“五四”歌谣学运动不同的是，学者不再单一地从搜集整理的角度出发研究歌谣，而是强调从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文艺学、美学等多视角切入，掌握其多层意义。

有学者将这一时期歌谣研究的变化总结为三点：“第一，过去只重文本的文学价值，只看到其表层意义，将歌谣与民族文化深层割裂，现在则主张把歌谣当成民族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是将民族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习俗、信仰、价值观念融汇一体的综合艺术；第二，过去片面强调其作者的阶级地位、其题材、主题等，只重其思想教育和道德感化作用，现在将其作为民间传承的知识、一种精神文化的知识看待，除了教育、感化

^① 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页。

^② 蔚家麟、鄢维新、朱蓓：《歌谣研究资料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湖北分会编印内部资料1989年版。

^③ 其中包括钟敬文的《民间歌谣》、乌丙安的《故事歌》等具体研究，也有关于民间歌谣搜集整理的方法介绍，如郭沫若的《关于大规模搜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贾芝的《如何整理歌谣》、石根的《论民歌的改编》等文章。

作用外，还有认识的作用；第三，过去用静止、僵化眼光将歌谣堪称古老文化的‘遗留物’和历史的‘回声’，现在认识到它是不同时代的历史积淀物，其传承和变异从未停止过，是活态的。”^①

随着民间文学、民俗学专业的设置，尤其是《民间文学》成为很多大专院校中文系的必修课，产生了一些民间文学的教科书，如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②，刘守华、巫瑞书主编的《民间文学导论》^③，段宝林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④，黄涛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⑤，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⑥等。民间歌谣作为教科书中必须涉及的一部分，学者们围绕其做了相关的研究。

除了对民间歌谣进行概论性的描述外，以区域或民族为单位的歌谣研究也很多。但是一直以来，研究者常常将活态的、整体的民间歌谣分割成歌词和音乐两个部分，歌词属于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研究范畴，而音乐归属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畴。

^① 赵晓兰：《歌谣学概要》，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

^② 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该著作除了对“民间歌谣”专列一章进行阐述以外，还专列“民间诗人、歌手和故事讲述家”为一章，强调对民间歌手的研究，“对深入掌握民间文学的特征，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的新发展，都将很有帮助”。

^③ 刘守华、巫瑞书：《民间文学导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362页。该著作忽略了民间歌谣的音乐性和民俗性，只从民间歌谣的文本上进行文艺学的解读和审美分析，对民间歌谣的研究概述较为简单。

^④ 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该著作将“民间歌谣”专列一章来论述，对“民歌”与“民谣”作出区分，强调民歌多抒发主观感情，不像民谣带有较大的客观描述性质。将民歌分为山歌、爬山歌、信天游、花儿和少数民族民歌五个体裁，并运用大量的歌词对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分析。

^⑤ 黄涛：《中国民间文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53页。该著作除了对民间歌谣进行定义、分类及其艺术特征和功能进行介绍外，增加了“歌俗”、“歌节”和“歌手”的部分，凸显了民间歌谣的传承载体和传播主体。

^⑥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258页。该著作认为民间歌谣是叙事和抒情的一种韵文演唱形式，是民众表达情感最为便利和快捷的歌唱传统，并将“民间歌谣”与“歌唱传统”对接起来，并提出民间歌谣具有“表达民俗礼仪的内涵”、“民歌是一种方言的演唱”。

20世纪80年代后，部分学者对民间歌谣的研究尝试新的突破，产生了大量的著作。在民歌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上，学者强调要从田野调查的实际出发，集中力量对某一地域或某一类型的民歌的生成、流变、相互影响、融合、分离，以及因其地理、历史、语言、社会演变等原因带来的一致性与差异性进行研究。天鹰在1988年的《民间文艺季刊》上连续发表了《长江下游地区民歌的生成与演变》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民歌的差异和一致性》等力作，对长江流域的民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带动起了地域文化与民歌研究的热潮。

仪式中的歌谣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之一。谭达先在《中国婚嫁仪式歌谣研究》^①一书中对婚礼仪式中的歌谣作了专题研究，该书分为中国婚礼歌研究和中国哭嫁歌研究上、下两篇，认为婚礼歌是结婚当天仪式中所唱的歌谣，而哭嫁歌是结婚前的一种仪式歌谣。笔者认为，哭嫁是一种婚俗，也是婚礼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哭嫁歌的一个传承载体，对哭嫁歌的研究不能脱离该习俗。薛艺兵不仅对仪式和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做了详细的梳理和解释，并运用该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五个不同地区五种不同类型的民间祭礼及其音乐进行了个案研究和多个个案的比较研究，最后作者用“神圣的娱乐”——即“信仰是仪式的神圣主题，音乐是仪式的娱乐方式”解释了中国民间音乐祭礼的本质特征。^②夏敏则在环喜马拉雅的宗教文化圈中透视民歌与人类生活文化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作为一种生长的文化，民歌是如何伴随人类一同在仪式生活中传播与涵化的，并提出民歌在族内是传承性传播，而族际间则是跨文化传播。^③

20世纪90年代初期，杨民康提出要把中国民歌放到乡土社会的背景

^① 谭达先：《中国婚嫁仪式歌谣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② 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夏敏：《喜马拉雅山地歌谣与仪式——诗歌发生学的个案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下去考察^①。后期民族音乐学者周耘的《中国传统民歌艺术》^② 对“传统民歌”作出如下定义：传统民歌是指历史上产生的、绵延流传至今的民间歌曲，这类民歌在长期的发展传播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体裁形式特征和审美特色。特别指出加“传统”二字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想强调民间歌曲的历时性特征；二是为了区别于一些现代专业作曲家创作的、带有民间音乐风格的作品。系统梳理了我国各民族传统民歌发生、发展、传承、变化的历史流程，并加上谱例，对 348 首传统民歌进行赏析。可惜这两部作品均未见具体的个案。

我国很多少数民族至今仍保留着民间歌唱的习俗，因此相关研究成果的涉及面也十分广泛。如覃德清等人编著的《诗性的思维——壮侗民族民歌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调查和研究》^③，认为壮侗民族“以歌代言”习俗是诗性思维和诗性智慧的杰出代表，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梳理壮侗民族民歌习俗的文化谱系，阐发壮侗民族民歌的文化价值，为民族文化复兴和人文重建提供了理论依据。陆晓芹以地方性节日和歌赛为载体对当地壮族民众的歌唱传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民俗志描写，作者以个案切入，在寻求弥合歌词文本与具体语境分离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尝试。^④

徐新建的《侗歌研究五十年——从文学到音乐到民俗》^⑤ 一文对 20 世纪后 50 年中国侗歌研究进行梳理，从“文学眼光：歌辞研究”、“音乐世界：歌曲比较”、“民俗考察：族群与文化”三个方面展开评述，认为“侗歌研究从学者的书斋走向了乡村田野，并把自己的力量植入到了后者的现实演变之中”，但“在这种由外及内的研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侗歌当事人的自我声音几乎被完全遮蔽了，真正的原创者及其生动事象却被隐

^① 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周耘：《中国传统民歌艺术》，武汉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覃德清等：《诗性的思维——壮侗民族民歌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调查和研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年版。

^④ 陆晓芹：《乡土中的歌唱传统——广西西部德靖一带壮族社会的“吟诗”与“暖”》，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6 年。

^⑤ 徐新建：《侗歌研究五十年——从文学到音乐到民俗》，《民俗曲艺》2001 年总 131 期。

退到难以看清的文本后面，他们的感受、处境和言语、想法还和我们离得很远。如何且能否使彼此沟通契合，还需要思考和探寻”。

在西北民歌“花儿”研究中，柯杨则指出：“任何一位研究者要想真正认识花儿会上民歌的价值所在和文化意义，就必须把演唱环境的诸多因素一律纳入自己的观察和研究视野。”^①为了将歌唱活动与地方传统更好地结合在一起，郑土有以吴语叙事山歌为研究对象，提出吴语叙事山歌在民间是一种“活态”的存在，演唱既是它的存在形态、表达方式，也是它的“载体”，脱离了演唱也就失去了其活态的生命，因此作者将吴语叙事山歌的传统定义为“演唱传统”。^②徐霄鹰的《歌唱与敬神：村镇视野中的客家妇女生活》^③则是更为深入的田野民俗志的调查报告，作者选取了民间信仰仪式和山歌演唱两个维度，描述了客家妇女在山歌领域中的身份、组织、活动、人际关系以及她们的观念和行为解释。作者从女性视角，分析生活语境中女歌手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阐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都比较新颖，但是该著作关注的核心是“客家妇女”，而不是“歌”。

同时，亦有学者开始注意到歌谣研究中不可忽略个人因素，通过个人去书写社会历史的变迁。臧艺兵的《民歌与安魂：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的互动》^④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背景下，通过对一位汉族民间歌手个人命运的描述与阐释，认为民间歌者与其生活的社会、与其体验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关系是一种互为依存、互为建构的互动关系，而建立这种互动关系的中介是民歌文化。作者高度肯定了民歌研究的重要性，指出“民歌文化中所蕴含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崇尚自由、尊重差异、共生共荣和谐统一的共享精神，正是当今人类最为缺乏，然而又是最为必需的生存智慧”。

^① 柯杨：《听众的参与和民间歌手的才能——兼论洮泯花儿对唱中的环境因素》，《民俗研究》2001年第2期。

^② 郑土有：《吴语叙事山歌演唱传统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徐霄鹰：《歌唱与敬神：村镇视野中的客家妇女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臧艺兵：《民歌与安魂：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